

民俗研究与诗经研究

——说狐、茅

李 湘

(河南省社会科学院)

关于对《诗经》中所记众多名物的研究、注释,一向著作甚丰,对诗歌之思想内容的理解与审美情趣的发扬,都有重要的贡献。但如在《诗经》情歌中,有那么多鱼字,或食鱼、或钓鱼、烹鱼等等,两千年来,解者如云,却只能作一点字面上的解释,不知其真谛何在,直到闻一多先生《说鱼》出,证明鱼字乃《诗经》中一个象征男女爱情的隐语,这才豁然开朗,吹散两千年来迷雾。而象这一类的问题,在《诗经》中显然还有不少,等待我们去研究。那么,这里先说两个字:“狐”与“茅”。

一 先说“狐”。

《诗经》中写到“狐”的诗篇,大概可有两类。一类是写有关服饰的,如“取彼狐狸,为公子裘”(《邶风·七月》)之类,这不在本文研究范围。另一类,写“狐”为社会生活的象征物,只从字面上读不懂,便是本文的研究对象。例如:

南山崔崔,雄狐绥绥。鲁道有荡,齐子由归。既曰归止,曷又怀止?

(《齐风·南山》之一章)

这首诗,如只从动物学意义上解“狐”,便完

全无济于事。《南山》这首诗,是讽刺齐襄公与其同父异母妹文姜通淫其后文姜嫁给了鲁桓公,却仍然屡次回齐与齐襄公相会的事。请看历代直至当今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注家对诗中“雄狐”的解释:

《郑笺》:“雄狐行求匹偶于南山之上,形化绥绥然。兴者,喻襄公居人君之尊,而为淫,佚之行,其威仅可耻恶如狐”。

朱熹《诗集传》:“狐,邪媚之兽……言南山有狐,以比襄公居高位而为邪行。且文姜既从此道归于鲁矣,襄公何为而复思之耶?”

闻一多《风诗类钞》:“狐,淫媚之兽。雄狐喻齐襄公”。

北京大学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》:“狐是淫兽,故以雄狐喻齐襄公。”

除以上诸家之外,再看近年出版的十几部选注或全释,也似毫无例外地与上述诸家同解。然而,只要稍作深究,就可发现这个自古以来的想当然的解法,实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矛盾:一是同解释《诗经》中另外一些言“狐”的篇章时所出现的矛盾。二是同解释本篇另外章节时所出现的矛盾。现先说第一个方面的矛盾,请看《卫风·有狐》:

有狐绥绥,在彼淇梁。心之忧矣,之子无裳!

此诗咏一女子对一个无裳无服、生计困难的男子的爱怜。此诗同《南山》一样,也言“有狐”,但诗中的这个男子(之子)却是一个穷人,或因某种原因而遭到困难的人,并看不出这是一个品质不良的邪淫之徒,这是大家同意的。那么,这就是一篇正面吟咏男女间正当爱情的恋歌,即使象卫道较严的朱熹所说,此诗写的是“国散民乱、丧其配偶,有寡妇见嫠夫而欲嫁之,故托言有狐独行,而忧其无裳也。”(《诗集传》)这嫠夫又何邪淫之有?所以,姚际恒就干脆抛开朱传而自立解辞说:“此诗是妇人以夫从役于外,而忧其无衣之作”。(《诗经通论》)那么,这《有狐》中的“有狐绥绥”同《南山》中的“雄狐绥绥”,本是两个意思相同的兴句,为什么在《有狐》中兴起正面的爱情,而在《南山》篇却竟以邪淫之兽的形象去兴喻齐襄公呢?这就完全不符合《诗经》中这类同型词组、同型兴句在

同类诗篇中的使用规律。

再说第二个方面的矛盾，即在解释《南山》自身的另外章节中所出现的矛盾。请看其第二章：

葛屨五两，冠绥双止。鲁道有荡，齐子庸止。既曰庸止，焉又从止？

可以看得很明显，这第二章，同那“雄狐绥绥”的第一章，基本是个叠章，除前边的两个兴句不同外，其余的后四句，从句型到句义，可说基本相同，都是咏鲁道平坦，文姜归鲁，亦即鲁桓公娶文姜的，这两个兴句不同，只是起兴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。然而，自历代直至当今，却大都只承认这第二章的兴句，亦即“葛屨五两，冠绥双止”，是兴起文姜与鲁桓公之婚事的，而不敢承认第一章之兴句，亦即“南山崔崔，雄狐绥绥”，也是兴起文姜与鲁桓公的婚事。其原因，就因这第一章的兴句中有“狐”字，而“狐”又是所谓的邪媚之兽，便只好不顾这一章的本义，便硬派它去兴喻品质不良的齐襄公了。这就是又一个明显的矛盾。

二

从我们所得到的的一些有关民俗方面的信息中，不但没有关于“有狐”的邪恶、淫媚之类的贬词，而倒恰恰是视“狐”为瑞应之象或直接以为良好婚娶之征兆的。请参看下列的有关资料：

《瑞应图》：“九尾狐者，六合一同则见。文王时，东夷归之”。这是说，文王时，天下升平，就出现九尾之狐，是大吉大利之象征。王褒《四子讲德论》：“昔文王应九尾狐，而东夷归周。”这都是一个意思。所谓九尾，当然不是真的。狐尾蓬大而美，以九名之，估计原是个美称。九尾者，蓬尾也。以后辗转传说，便带上了神秘性。

《春秋潜潭巴》：“白狐至，国民利；不至，下骄恣”。这说得最具体，白狐出现，利国利民。

《孝经援神契》：“德至鸟兽，则狐九尾”。这是说，在位者的仁德普及到鸟兽，则出现九尾之狐，同上述诸例同义。

以上是关于“有狐”在天下治乱、国计民生方面的瑞应之象的一些信息，下边再看直接关于婚姻方面的一个重要传说，载于《吕氏春秋》：

禹年三十未娶，行涂山，恐时暮失期，耕

曰：“吾之娶，必有应也”。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。禹曰：“白者，吾服也；九尾者，其证也”。于是涂山人歌曰：“绥绥白狐，九尾庞庞。成于家室，我都攸昌”。于是，娶涂山女。

玩赏这一段传说，我们可立即想起闻一多先生在研究《周南·芣苢》一篇时所说的：“古籍中凡提到芣苢，都说它有‘宜子’的功能，那便是因禹母吞芣苢而孕禹的故事产生的一种观念”。（《匡斋尺牍》三）那么，我们读上述大禹应白狐而娶涂山氏的传说，同样不是也可以认为在《诗经》的时代，照例会留下一白狐出，利婚娶的观念吗？我们把这篇《涂山歌》中的“绥绥白狐……成于家室”同上述《齐·南山》的“雄狐绥绥……齐子由归，作对照，就可看出两者的结构与情趣何其相似乃尔！所以，可以肯定地说，上述那一系列关于“有狐”乃邪恶之象的传统解说，全不符《诗经》时代的民俗观念，是恰恰把事情说反了。而结论就必然是：“南山崔崔，雄狐绥绥”的真谛，乃兴起美好婚姻。根据这一结论，我们就可以宣称，这《齐·南山》篇的首章，是以“雄狐绥绥”为兴，去象征鲁桓公娶文姜之婚事，同第二章以“葛屨五两”为兴去象征鲁桓公娶文姜，完全一体同型，只是角度不同。

从上述关于“有狐”在古代诗歌中的用法看，似也带有了明显的隐语的性质。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这方面难题中，给我们作出过卓越的贡献，可在“有狐”这个问题上，他也竟迷于旧说，把事情说反了。

三

那么，根据上述所作的这一追源性调查，及这一相应的结论，我们就可继续纠正在另外两个言“狐”的诗篇中过去所一直存在着的误解或迷惘。请先看《邶风·北风》：

莫赤匪狐，莫黑匪乌。惠而好我，携手同车。其虚其邪？既亟只且！（第三章）

此篇的特点是，不但有一个“狐”，而且有一个“乌”字。所以在历代直至当今的一些解释中，便存有更多的误解，并且离开了男女关系的范围，把这一篇的“狐”，解释为政治腐败和昏君乱臣的象征。请看：

《毛诗序》：“北风，刺虐也。卫国并为威虐，百姓不亲，莫不相携持而去焉”。

《郑笺》：“赤狐则也，黑则乌也，犹今君臣相承，为恶如一”。

《诗集传》：“狐……乌……皆不祥之物，人所恶见者也。所见无非此物，则国将危乱可知”。

近年出版的大小论著，也多半作如是说，例如《诗经直解》：

今按，《北风》，刺虐也。百姓相约逃难之词。诗义自明，《诗序》是也。

从以上诸家，可大体看出古今所持之大体相同的解法。而闻一多先生，早在他四十年以前的《风诗类钞》中，却已简要地指定此诗是一篇男女之辞，并举言古诗“愿得常巧笑，携手同车归”即本《北风》。只是因为他在《齐·南山》的研究中，也曾解释“有狐”为比喻齐襄公的淫媚之兽，便形成为同解释《北风》这一篇的矛盾。闻先生对《北风》的解释是“狐喻男、乌喻女”，而我们则仍以上述结论为依据，“狐”视为婚姻的瑞应之象，同上述的《南山》《有狐》保持一致。另外，在此诗首章中作为全诗起调的“风雨”二字，也是被众多解者误以为时代黑暗、社会不宁之象征的，而其实，这“风雨”之象，在《诗经》情诗中也同样是男女欢会的象征性隐语。《诗经》自身既有许多内证，《周易》的《睽·上九》就明言：“……匪寇，婚媾。往，遇雨则吉”。这是无需怀疑的。那末，这《邶风·北风》之三章的意思，就理应作这样表述：“不红不是狐，不黑不是乌。君子惠爱我，挽手同登车。车子请慢些，开得太快喽！”这哪有一点逃难的情调？

下边，也还有必要讲一讲《小雅》的《何草不黄》：

何草不玄，何人不矜。哀我征夫，独为匪民！
(之二章)

有芼者狐，率彼幽草。有栈之车，行彼周道！
(之四章)

《何草不黄》这一篇，同《北风》不同，倒是真的咏唱西周末期之社会动乱的。全诗咏的是，征夫在外，长期不得与家人团聚的哀愁。先看其第二章所唱的：“哪里草儿不枯黑！哪有人儿不打光棍……”！等等，这是何等的哀怨。那么，其第四章里也恰恰有个“狐”字，又应当作何理解？清人方玉润只这样说了几

句：“旷野之间，无非虎兕，幽草以内，尽是芼狐，此何如荒凉景象乎？”（《诗经原始》）而略早于方氏的明人季本，倒说的比方氏具体些：“狐有狡计，能避患，而率由幽草之中，常自逸也。……乘此车行于周道者，皆愚弱之民，非若狐之能避于幽草者也”。（《诗说解颐》）按此季氏的观点，虽仍持传统旧说，指狐为狡猾之兽，但其整个的意思，却使人意识到，当征夫们在茫茫旷野忍饥受寒的极端困苦中行走时，看见蓬尾之狐躲在草丛中表现出暖适和自由的生态，便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羡慕的感情了。那么，这就是一种反衬式的起兴结构。而我们认为，除此一点之外，却仍须同上述几篇中关于“有狐”的意义相联系，看出它所赋有的在更深层次上使人联想到婚姻、爱情、家室、团聚等等隐含的象征属性，这大概才可以真正地领会到这“有芼者狐”之章的真谛。这样，我们在《诗经》全部使用“有狐”兴句的诗章中，便找到了一个统一的、不再矛盾的，大概也符合当时民俗之实际的解释了。

闻一多先生曾对喻和隐这两字作过一次很有趣的解释。喻训晓，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，隐训藏，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不明白点。但二者也互相包含，喻中也有隐，隐中也有喻。隐的作用，也不是消极的解决困难，而是积极的增加兴趣，这便是隐语的魔力的源泉。那么，上述所论《诗经》中的这些“狐”字之为用，大概也可称为一种隐了。

四

再说“茅”。

《诗经》中写到“茅”字的诗篇也有两类。一类是写“茅”为劳动对象的，例如“昼而于茅，宵而索綯”（《幽风·七月》）就是，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。另一类，是写“茅”为社会生活的象征物，也是很难读懂，便必须加以研究。请先看《小雅·白华》之一章：

白华菅兮，白茅束兮。之子之远，俾我独兮！

这首诗，是周人讽刺幽王的。《毛诗序》云：“幽王取申女以为后，又得褒姒而黜申后……周人为之作是诗也。”古今学者研究，大多同意《序》说。从有关资料及诗歌之内容判断，

也觉可以相符。至于其作者为周人或申后自己,则当然无法断所,只能说它是第一人称写法。

关于对此章之“茅”字的象征义的理解,历代论者甚多,有一种解法,是以白华喻申后,主褒意,以白茅喻褒姒,主贬意的。学界多以为《郑笺》主此意,而其实说得最明白的是季本:“白华已沤则为菅,有为索之用,而白茅则不可用也。白华为白茅所束,犹嫡为妾所制,而不得有为也。”(《诗说解颐》)那么,这就既与解释本篇之第二章有矛盾,同时也与解释另外的诗篇有矛盾。现先说第一个方面的矛盾,看本篇之第二章:

英英白云,露彼菅茅。天步艰难,之子不犹!

这二章的意思是说,天上的英英白云还无私地覆盖着地上的菅(白华)和茅(白茅),而变了心的幽王却不再爱护可怜的申后。那么,如象郑氏、季氏之意,以第一章之白华喻申后、白茅喻褒姒,而这第二章却又咏白华、白茅同受上天的恩泽,这不明明摆着是个很大的矛盾吗?是解释不通的。

下面再说第二个方面的矛盾,亦即与解释另外几个诗篇的矛盾。请先看《召南·野有死麋》:

野有死麋,白茅包之。有女怀春,吉士诱之。(第一章)

林有朴樕,野有死麋。白茅束之,有女如玉。(第二章)

这两章,都是写一个姑娘正在春心萌动之时,有位青年人把自己猎得的麋鹿用白茅包了送她,向她表示爱情的。而且是纯洁的爱情,无其他不洁的因素,这是看得很明白的。特别这第一章中的“白茅包之”一句,同上边《白华》篇的“白茅束兮”一句,可以说连句型都是基本一样的,那怎么可以设想这白茅在此处是表示纯洁的爱情,而在《白华》里就要主贬意,变成为邪恶的象征了?这是不好解释的。再看《邶风·静女》之三章:

自牧归荭,沔美且异。匪女之为美,美人

之贻。

此例是咏一个男子从一姑娘手中得到了她从郊外牧所带来的白茅(白茅始生称荭)赠品,他高兴地说白茅又奇又美,赞叹不已。这就是说,白茅在这一例中,仍然是爱情的象征,而且也是十分纯洁。

还有另一种解释法,就是菅茅相依为用说。此可以朱熹为代表:“读《诗》之法,且如此章,盖言白华白茅尚能相依,而我与子乃相去如此之远,何哉?”(《朱子语类》)今人陈子展先生的《诗经直解》也仍持此种看法,认为这《白华》第一章是:“以菅茅皆相沤相束为用,兴夫妇相须为活。反兴幽王相弃,而申后独苦”。但是,这也仍不免令人生疑:例如说,为什么以菅束茅,就必言二者相依?这相依的概念是什么?如系指不能分离,为什么在《静女》篇却只咏个“自牧归荭”(上边说过,白茅初生称荭),把白茅单独作赠品,不与白华相依了?这不恰恰是象征分离吗?这显然也是不可置信的。

还有第三种解释法,就是以茅菅喻洁白,亦即喻申后说。此可以姚际恒为代表:“愚意,白华、白茅,皆以比己之洁;菅兮、束兮者,所以状华与茅之用也。”(《诗经通论》)这比前两个解法略显朴素些,无造作附会之气,但要全从洁白上取意,则恐也未必。因为,菅是沤的,白华经沤浸之后未必就全是洁白,请参照《陈风·东门之池》:“东门之池,可以沤菅。彼美淑姬,可与晤言”(之三章)。这也是以白华(菅)兴起男女间爱情的,而辞面上却只咏沤菅,不用白华之字样,显然是不在洁白上取意。而且其第一章是咏:“东门之池,可以沤麻……”,第二章是之“东门之池,可以沤纻……”。从这三个沤字看,大体可以悟出,其着意暗示的应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。这是因为,菅、麻等物必须经沤浸之后才能变得柔韧或被剥下皮来,以便制为绳索,或编织生活器物,为人所用。所以,姚际恒所说的他那下半段话:“菅兮,束兮者,所以状华与茅之用也”。才算是基本正确的,只是这

白华、白茅在怎样的意义上被使用？又在使用的基础上形成了怎样的象征义？他也仍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了。但只要能如同上文所追寻的“有狐”之传说意义一样，能得到一些有关方面的线索和信息也就可以了。那末，请先看《周易》中的一段爻辞：

《大过·初六》：“藉用白茅，无咎”。

这一爻虽只六个字，又说得极笼统，但它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信息：一是说，白茅在古代可用做藉（藉为古席子）子铺垫；二是说，在某些重要的生活和社会活动中，用茅藉做铺垫，可以主无咎，无咎即无灾，亦顺利、平安之意。

请再看下边的另几条信息：

《礼》曰，封诸侯以上，藉以白茅”。席是什么？《说文》：“藉，茅藉也”，茅藉即茅席。

《庄子·达生》“十日戒，三日斋（斋），藉白茅”。

《六韬》：“吕尚坐茅而渔”。

这前两条是说，古代封诸侯的重大仪式及某些重要的斋戒活动，都要以白茅之藉做铺垫；第三条是说连姜太公钓鱼也不例外。这几条所记白茅为用的方面各不相同，因此也恰恰构成了关于上述《大过·初六》的具体补充，藉用白茅，主无咎。

请再看下边的另两条信息：

《典录》：“武王伐殷，微子启肉袒面缚，牵羊把茅，膝行而前”。

《尸子》：“殷汤救旱，素车白马，身婴白茅，以身为牲”。

这第一条是说，周武王伐殷，殷紂王之兄微子启投降请罪时，是把羊和茅合在一起作为献礼的，也就是“以茅包之”的一种象征，表示最为隆重与尊敬。第二条是说，商朝时发生旱灾，商汤为求天降雨，用的白马素车，并把自己用白茅缠住，也就是“以茅包之”，作为祭天的象征性贡品，表示最大的虔诚。

从以上诸项信息来看，尽管有的属传说，有的是爻辞，但却从不同的侧面，曲折地、共同地，反映着在《诗经》之稍前稍后的一段时

期中，所曾经存在过的一种风俗。这风俗就是凡在各种重要的仪式、盛典、祭祀、进贡等等场合，即或是个人方面的某些活动中，必以白茅为包裹、为铺垫，才足以表示最大的尊敬、最高的虔诚和获得无咎的、吉祥的信念。

在上述的各项信息中，虽没有直接看到关于白茅与爱情、婚姻方面之关系的正面记载，但从这些关于白茅之为用及其重要意义的种种说法中，我们可以悟出，白茅在《诗经》所吟咏的实际的爱情、婚姻生活中，也必然是作为不可缺少的礼品、用品而出现的。总之，只要使用了白茅，就是隆重、诚信、尊敬的重要象征和主无咎、主吉庆的重要象征。而且，这样一种礼俗，更必须是行之既久，在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不可违背的法则和十分牢固的观念，以后，只要在作品中提到白茅包、白茅束、白茅藉等等这一类的词句，就可立即在人们头脑中引起关于爱情和婚事的联想，这样，这些跳跃在诗篇中的普遍而又特殊的字眼，才能闪闪发光地构成真正的诗句。我们可以断定，《诗经》中的这些“白茅包之”、“白茅束兮”的句子，在当时的读者群中，是完全不烦思索，一读就懂的，而在今天却也象隐语一样，不易弄清其真谛了。记得在解放前的山东半岛一带，男女成婚，都由女方出嫁套，在村子中，只要一说到“一柜两箱”、“两柜两箱”等字眼，一字不提婚事，却连很小的儿童也会立即意识到是谁家要有喜事了。用这个例子作比语，未必一定恰切，却也有助于说明这些“白茅”诗句的民俗学意义。

白茅在《诗经》的情歌中是婚礼、婚事的象征物，因此也就是爱情的象征物。我们用这一结论来解释《诗经》中使用“白茅”之句的全部情诗，就可一通百通，取得理解和欣赏它们的钥匙。

（责任编辑：李芬）

1987年元月于郑州